

从突厥与中原的“和亲”策略透视突厥政权的兴衰

黄科缙

(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庆山市 38541)

摘要：突厥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北方游牧民族，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民族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深远影响。突厥政权的兴衰与中原王朝的“和亲”政策息息相关。“和亲”在中原王朝和突厥政权的互动中，既是双方权力博弈的手段，也是突厥政治发展、权力整合，乃至走向衰落的重要环节。突厥通过“和亲”得以在早期获得经济支持和政治声望，进而巩固政权；但其长期依赖“和亲”政策所带来的资源与中原的政治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突厥政权内在的脆弱性和分裂倾向。本文通过梳理突厥与中原的“和亲”历史，揭示“和亲”政策与突厥政权兴衰的关系与影响，并分析突厥政权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政治演变与权力变化。

关键词：突厥；和亲；中原王朝；民族交流；政治演变

DOI: 10.64549/jtii.v1i2.55

Exami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c Regim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Marriage Alliances” Strategy between Turkic and the Central Plains

Huang Kejin

(Yeungnam University, South Korea, Gyeongsan, 38541)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northern nomadic ethnic group in Chines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urks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ethnic political patterns. The rise and fall of Turkic regim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rriage alliance” policy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and the Turkic regime, “marriage alliance” was not only a means of power game between the two sid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wer integration, and even decline of the Turkic people. The Turkic people were able to gain economic support and political prestige in the early stages through “peace talks”, thereby consolidating their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its long-term reliance on the resources brought by the “peace and kinship” policy and the strategic pressure on the Central Plains also reflect to some extent the inherent fragility and separatist tendencies of the Turkic regim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peace alliance” between the Turkic people and the Central Plains,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impact of the “peace alliance” policy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urkic regimes, and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power changes reflected by Turkic regimes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Turkic people; Marriage allianc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Rise and fall; Political evolution

引言

突厥是中国隋唐时期最为重要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其兴衰对中原王朝的边疆稳定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突厥的崛起，不仅凭借其独特的游牧经济模式和军事优势，也得益于其灵活的外交策略^[1]。其在与中原王朝的外交互动中，“和亲”政策成为突厥获取资源、稳固政权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突厥政权的分裂与衰落，“和亲”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其效用也逐渐减弱。

一、突厥与中原“和亲”政策的历史背景

（一）突厥政权的兴起与其地缘政治环境

突厥政权的崛起始于公元6世纪，原本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部落的突厥，于公元552年推翻了柔然，建立了自己的汗国。突厥政权的兴起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缘位置和军事优势，突厥控制了从中亚到蒙古高原的广阔区域，成为了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同时掌握着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通道^[2]。这不仅为突厥带来了经济上的优势，也为其崛起提供了广泛的战略空间。但是突厥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其政权内部的统一与稳定，突厥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其内部部落众多，可汗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并且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中原王朝、西域诸国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这种环境下突厥需要通过中原王朝的互动（比如“和亲”政策）来维系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二）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与“和亲”传统

“和亲”是中原王朝处理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其最早可追溯至汉高祖时期与匈奴单于的“和亲”。通过与游牧民族联姻，中原王朝试图以较低的成本换取边疆的稳定，同时通过经济援助、物资交流等方式，建立相对和平的边疆环境^[3]。

隋唐时期，“和亲”政策在对突厥的外交活动中被广泛采用。隋朝建立后，面对强大的突厥政权，隋文帝通过“和亲”与突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盟友关系。唐朝建立后，唐太宗也多次利用“和亲”与突厥化解冲突。这种和亲政策不仅是双方政治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上的灵活性和现实性。

二、突厥与中原“和亲”的主要形式

（一）联姻与政治结盟

突厥与中原的“和亲”政策主要表现为突厥可汗与中原公主的联姻^[4]。突厥政权建立后不久，便通过“和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在隋朝时期启民可汗与隋朝公主联姻使得突厥与中原形成了稳固的政治结盟关系。这种联姻不仅是突厥获得中原支持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原王朝安抚突厥的重要举措。

（二）经济利益交换与文化交流

“和亲”政策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经济利益交换^[5]。突厥通过“和亲”获得了中原王朝的物资援助，包括粮食、布匹、金银和其他资源。这些物资对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可以满足其经济需求，还可用来维系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政治稳定。同时，中原王朝通过“和亲”也获得了突厥的马匹、皮毛等特产，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

“和亲”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行为，还促进了中原与突厥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和亲”的过程中，中原的儒家思想、汉字书写、礼仪制度等逐渐传入突厥，同时突厥的服饰、音乐、饮食习惯等民族文化也影响了中原^[6]。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和亲”策略的变化与突厥政权的兴衰演变

（一）突厥的崛起与“和亲”政策的助力

突厥政权早期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原王朝的“和亲”关系。在突厥政权建立不久的情况下，其内部尚未完全统一，外部也面临着柔然、西域诸国的威胁，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并不为过。突厥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和亲”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还借助中原王朝的政治声望稳固了自身的统治^[7]。正如之前提到的启民可汗通过与隋朝联姻获得支持，成功击败了内部的反对势力，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和亲”政策还为突厥政权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支持。在突厥的政治文化中，中原王朝被视为文明的中心，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尤其是通过联姻获得的政治认可，对突厥可汗的统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8]。这种合法性支持不仅增强了突厥政权的凝聚力，也为其扩张提供了信心和动力。

在突厥政权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和亲”政策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政治合法性，但是这种依赖性也使突厥政权的权力结构更加脆弱。突厥可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原的支持来维系其统治，而一旦这种支持减少或中断，突厥内部的矛盾便会迅速显现。除此之外，突厥对中原经济资源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经济独立性，使突厥政权在面对中原的战略压力时更加被动，为突厥最后的分裂与灭亡埋下了种子。

（二）突厥鼎盛时期的“和亲”与其政治变化

在突厥政权的鼎盛时期，其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显著增加。即便在这一时期，突厥仍通过“和亲”政策维系与中原的关系，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此时的“和亲”更多地反映出突厥对中原的战略需求。隋文帝时期，启民可汗与隋朝联姻后，隋朝将大批量的粮食、布匹等物资送往东突厥进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东突厥解决了游牧经济资源不足的问题^[9]。这些物资不仅用来满足民生需求，也被转化为突厥政权进一步扩张军事力量的资本，稳固了启民可汗的统治地位。突厥在与隋唐的互动中，通过“和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并利用这些资源加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稳固了统治权威^[10]。

突厥鼎盛时期的“和亲”也暴露出其内部的矛盾与分裂。由于突厥政权内部部落众多，经济资源的分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和亲”政策所带来的中原物资，往往被可汗用于维系其统治集团的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部的不平等与矛盾^[11]。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矛盾逐渐演变为突厥政权内部的分裂与冲突。东突厥时期，隋朝通过“和亲”将大量物资送给启民可汗，而这些资源大多被分配给支持可汗的核心部落，比如阿史那家族，而其他边缘部落则被忽视，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导致了各部落的离心离德，激化了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三）突厥的衰落与“和亲”策略的失效

突厥政权在其后期逐渐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独立政权。这种分裂不仅削弱了突厥的整体实力，也使“和亲”政策的作用大幅下降。特别是在唐朝崛起后，唐太宗采取了更加主动的战略，其通过军事打击和分化政策，逐渐瓦解了突厥的势力。随着东突厥的灭亡，“和亲”政策在处理突厥问题上的作用逐渐减弱。此时的突厥政权已无法通过“和亲”维系其内部的稳定与外部的支持，而中原王朝则通过更为强硬的手段重新掌控了边疆局势^[12]。

突厥政权的分裂与衰落，反映出其内部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尽管“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突厥的

分裂，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13]。特别是在唐朝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与军事策略后，突厥政权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最终导致其分裂与灭亡。

四、突厥与中原“和亲”策略的对民族关系和政治稳定的意义

突厥与中原的“和亲”策略不仅影响了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通过“和亲”，中原与突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联系，避免了长期的战争冲突，为边疆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条件^[14]。同时，“和亲”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在与中原的交往中，突厥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元素，推动了突厥汉化的进程，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15]。

突厥与中原的“和亲”策略表明，外交手段在处理边疆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相比于单纯的军事手段，“和亲”以较低的成本换取了较高的收益，为中原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突厥与中原的“和亲”丰富了中原王朝的外交策略体系。通过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中原王朝逐步形成了一套既包括军事打击、经济交流，又包括政治联姻的综合性外交策略。这种策略为中原王朝的稳定统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这一经验对于之后处理边疆问题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16]。

五、结论

从突厥政权的兴衰过程来看，“和亲”政策既为突厥带来了外部支持和内部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游牧政权对中原经济和政治资源的依赖性，从而加剧了其内部矛盾和权力分裂的风险。这种依赖性并非单一经济层面的支持，而是涉及突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权力整合的资源调配，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和亲”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原王朝对突厥政权态度的转变。在突厥崛起和鼎盛时期，中原王朝利用“和亲”换取和平与贸易，但随着突厥的分裂与衰弱，唐朝逐步采取更加主动的军事与外交手段，最终完成了对突厥的削弱甚至征服。这种从“和亲”到主动出击的政策转变，表明中原王朝在面对游牧政权时能灵活运用多种策略，而“和亲”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手段。突厥在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中，虽然能够利用“和亲”

策略迅速崛起，但其内在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决定了该策略也难以维系突厥政权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 [1]. 张爽.6世纪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与丝路——以突厥外交军事活动为中心[J].社会科学辑刊,2015,(06):153-158.
- [2]. 胡晓泉.突厥和亲与草原丝绸之路[D].烟台大学,2024.DOI:10.27437/d.cnki.gytdu.2024.000039.
- [3]. 刘梦玮. 西汉时期和亲政策及其对当代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D]. 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 [4]. 天明.论历史上的和亲[J].宁夏社会科学,1993,(04):49.
- [5]. 范香立,张金铄.唐与回鹘和亲原因解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02):102-105.
- [6]. 卢兴荣.和亲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J].中国校外教育,2012,(20):10.
- [7]. 闫德华.突厥政权和亲史述略[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4):16-20.DOI:10.14045/j.cnki.nmsx.2010.04.029.
- [8]. 崔晓莉.突厥与中原王朝联姻政策探析[J].安顺学院学报,2011,13(04):95-98.
- [9]. 岳雪莲.试析隋与突厥经济关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J].前沿,2010,(14):122-124.
- [10]. 王清泉.突厥政权和亲策略的演变[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24(07):92-97.
- [11]. 范香立,张金铄.唐与回鹘和亲原因解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02):102-105.
- [12]. 朱敬玮.唐与东突厥关系探析[D].烟台大学,2020.DOI:10.27437/d.cnki.gytdu.2020.000090.
- [13]. 闫德华.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06-108.DOI:10.13727/j.cnki.53-1191/c.2008.03.015 .
- [14]. 赵泽斌,张利洁.唐太宗时期的和亲政策刍议[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04):7-11.
- [15]. 胡晓泉.突厥和亲与草原丝绸之路[D].烟台大学,2024.DOI:10.27437/d.cnki.gytdu.2024.000039.
- [16]. 师帅.从唐王朝和亲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J].文教资料,2017,(18):65-67.